

归义军时期敦煌僧官的选擢因素

孙 宁

摘 要:敦煌文书中保存了许多唐宋之际的各类僧官名号,而关于僧官选拔、升迁的具体因素,不论出土文书还是传世文献都鲜见完整记载。本文从敦煌文书入手,以归义军时期的僧官为对象,初步探讨了缙流官僚的选擢因素:佛学素养、家世背景、自然寿命、法缘关系以及可能存在的群体因素,其中前两者是出任僧官基本而重要的条件。这是切合历史实际的,可以对僧官选拔的研究提供有益认识。

关键词:敦煌;归义军时期;僧官;选擢因素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1)05-0080-09 收稿日期:2011-05-20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0LSA001)

作者简介:孙宁,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 210097

《通典》卷十五《选举典》三曰“其择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言词辨证;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①。这是世俗官员的选拔标准。

明复的《中国僧官制度研究》^②第四章第三节“唐宋时期之僧政与僧官”强调了唐代管理佛教事务的机构与政策的完密,并指出了宋代僧官之虚设而乏实效。竺沙雅章的《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③后编“敦煌佛教教团研究”详究了敦煌的僧官制度,按照等级大小分为僧统、教授、僧录、僧政、法律、判官、寺职等六级。谢重光、白文固的《中国僧官制度史》^④第五章叙述了吐蕃占领期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僧官制度。荣新江的《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⑤第九章介绍了归义军时代敦煌佛教与佛教界的基本情况,并

考证了历任河西都僧统与其在职年代。郝春文在《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⑥一书的第八章中,指出归义军政权对佛教控制与管理的严格。上述论著对僧官选拔与升迁的具体因素则鲜见完整涉及。就本文主旨而言,有研究认为,当时僧人的升迁主要靠与归义军节度使关系的好坏疏近,而非完全依靠自身的佛学修养^⑦。这一见解并不全面,如高级僧官的任免与升迁确由节度使严密控制,但一般只控制到僧政、法律^⑧,寺院一级的僧官与职事往往是都僧统或都僧政等高级僧官直接管辖的。鉴于此,有必要讨论一下僧官的选擢因素。

一、以佛学造诣为中心的知识素养

敦煌文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僧官名号,寺级僧

①[唐]杜佑撰《通典》卷十五《选举典》,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4页。

②明复《中国僧官制度研究》,台北:明文书局,1981年。

③竺沙雅章《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82年。

④谢重光、白文固《中国僧官制度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⑤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⑥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⑦郑炳林《晚唐五代归义军政权与佛教教团关系研究》,《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1期。

⑧郝春文《归义军政权与敦煌佛教之关系新探》,《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64-175页。

官除了以三纲为代表的寺职外,还有僧政和法律^①,而寺主、上座、维那等职是僧人仕历的起点。以归义军前期名僧悟真为例,伯3720《大中五年至咸通十年(851—869)赐僧洪辩、悟真等告身》、伯3770《敕河西节度使牒稿》及斯1475《沙州寺户严君便麦契》等文书显示了十分清晰的仕宦轨迹:灵图寺寺主→都法师→都僧录→副僧统→都僧统。悟真始自寺院三纲之一,终至最高僧位,每一个升迁步骤都历历可查。

但对寺级僧官与高级僧官的选拔因素要加以区别,因为寺院纲管选拔注重的是候选者的实际能力。据伯3100《乙巳年(885)十二月寺主道行辞职状》,无论道行自述还是都僧统悟真“成功益绩,课效尤多”的判辞,皆认可了他在寺务上的出色本领。同卷《景福二年(893)徒众供英等请律师善才充寺主状》^②谓善才“一期金举,必赖斯人,理务之间,莫过此者”,悟真判曰“寺舍广大,金举一人,还须勘任”;斯6417《同光四年(926)三月金光明寺徒众庆寂等请僧法真充寺主状》^③言法真“善解裁邪,就政亦有巧女之能,缉治寺务之间,须功幹殷勤。”海晏判曰“金光明大寺,洪基不少,要藉公干能仁,僧徒仰之宽泰,人户则有爱恤之能”,皆因能力出众而批准。斯1073号《光化三年(900)四月徒众绍净等请某乙为寺主牒稿》、斯6417《清泰二年(935)三月金光明寺上座神威等请善力为上座状》等不乏能力方面的评价。部分文书揭示了寺务处理的艰难,伯3753《大顺二年(891)正月普光寺尼定忍等辞职》乃寺主慈净等四尼的请辞文书,曰“在寺无一毛之益,在家有困然之机”,以至“陷公损私”,恳请僧统拣择勘任者与之差替。故出任寺职甚至被称作劳役,如上引斯6417有“罗汉不免僧役,和尚向是凡僧”;同号《长兴二年(931)正月普光寺尼徒众圆证等状》载海晏判曰“尼人役次,苦乐宜均”。僧俗关

系良好、管理秩序稳定是建立在信任其能力之上的,故在寺职人才的推选上,僧人处理寺务的能力往往是重点。

而在高级僧官文书里,强调的则是佛学修养与持戒谨严。上引悟真第二件都僧录告身^④云其“八解修行,一音演畅,善开慈力,深入教门。”第三件副僧统告身^⑤云“深移觉悟之门,更洁修时之操。慧灯一照,疑网洞开。”两者都是在悟真的佛学水平上进行评判。据伯3770《敕河西节度使牒稿》,他获任都法师一职,显示的也是“性惟水静,行洁霜明,学富五乘,解圆八藏。释宗既奥,儒道兼知”的因素。通篇考察文书后并未发现对悟真办理寺务能力的明显评定。斯515背《开元寺律师神秀牒补充摄法师牒》载神秀被擢为摄法师,理由是“戒如金宝,法护神融”,亦未提及能力如何。

因此,僧官得以被选拔、进一步升迁主要在于自身的佛学素养和戒行是否圆满。敦煌碑志、窟铭及邈真赞等资料里保存了不少这类信息,如伯4640《吴僧统碑》^⑥赞扬吴僧统“维摩唯识,洞达于始终;横宗竖宗,精研于本末”,是为缁俗人师。伯4660《译经三藏大德吴和尚邈真赞》^⑦谓“西天轨则,师谓深知。八万既晓,三藏内持。(归唐后)愿谈维识,助化旌麾”,其人在弘法事业上贡献良多。同号《河西都僧统悟真邈真赞》^⑧云悟真“精五部而政行,严七觉以澄非。练心入理,刻意修持……讨瑜伽而麟角早就,攻净名而一览无遗”,同号《都法律大德汜和尚写真赞》^⑨称“非论持律,修禅最能……昔时罗什,当代摩腾”,可见造诣甚深。

伯3556《应管内外释门都僧统帖》^⑩申明“出家释子,先将戒行为基;入法净人,切以律文为本。”这是都僧统奉官处分要求众僧尼严格持戒

①季羨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638页。关于寺级僧官、法律多滥的原因,王祥伟《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纲管新论》(《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6期)一文认为是吐蕃与归义军时期前后改革僧官制度所致,敦煌寺院纲管由原来寺主、上座、维那组成的三纲体制演变为寺级僧政、法律、判官、寺主、上座、维那组成的新的六纲体制。

②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46-47页。

③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55-56页。

④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30页。

⑤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31页。

⑥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91-94页。

⑦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第136页。

⑧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第129页。

⑨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第145页。

⑩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第174-175页。

的,而僧官在弘扬戒学上更应以身作则。敦煌文书中对高僧大德的戒行表达丰富,比较经典的是“戒月圆满”。如伯4660《曹僧政邈真赞》云“弱冠进具,戒圆秋月”,同号《阴法律邈真赞》之“戒月圆满,非尘不污”等等。通常用以赞扬持戒的还有鹅珠一词,斯2113《龙兴寺上座德胜功德记》谓其弟法真“戒护鹅珠,澄清转洁”。至于戒珠、戒香等修辞亦散见于文书,如伯3630《都僧政会恩阁和尚邈真赞》^①云其“自从进具,威仪不失于三千;得受戒香,驻想匪亡于八万”。同时还有“精持戒律,白日无亏”^②等其他表达。比丘尼的戒行得到同样重视,伯3556《后周敦煌大乘寺法律尼某乙邈真赞》^③云其“帔缁就业,八万之细行无亏;禁戒坚持,三千之威仪匪犯”,又伯3556《后周故普光寺法律尼清净戒邈真赞》所述得窥持戒之严。

僧官大德们在佛学与戒行上的精深修为极见推崇。斯520+斯8583《报恩寺方等道场司请诸司勾当牒》是件安排僧官大德主持受戒仪式的重要文书,曰“右件诸司所请禅律大德律师等,窃缘释迦留教,律宝朗然,累代精修,不闻隳坏。”归义军当局对于这些僧官自有一套称呼,伯3718《程政信邈真赞》^④云“太保统握河陇,国举贤良。念和尚雅量超群,偏赐恩荣之秩”,同号《喜首写真赞》^⑤曰“尚书谯公秉政光曜,大扇玄风。举都以荐贤良,师乃最称第一”。贤良的标准即戒行出众与学识高超两点。

除了佛学造诣和持戒,其他学问上的修养与其共同构成了僧官知识素养的整体。伯3556《都僧统汜和尚邈真赞》^⑥称道“儒宗习礼,三冬豹变而日新;一览俱彰,七步成诗而日晨”。同号《内外都僧统河西佛法主法严邈真赞》谓法严“三冬豹变,业就儒宗……交宣百行,孔氏再诞今时”。斯3702《讲经和尚颂》称赞梁僧政“洞晓五乘,情闲八藏”时,又云其“业修三史,善统九流”。伯

4660《索法律智岳邈真赞》^⑦云智岳“真乘洞晓,儒墨兼宣”,同号《都僧统翟和尚邈真赞》言其“五凉师训,一道医王”,同号《金光明寺故索法律邈真赞》赞曰“神农本草,八术皆通”。不胜枚举。由此,这些最终获任僧官的普通僧人,其佛教学行而外——以儒学知识为中心的世俗学问、文辞、医术等素养不容小觑,也是起仕升擢的当然阶梯。

不论儒家典籍还是文章辞赋都是僧人学习抄写的对象,并且敦煌的寺学^⑧是教授儒经的,曾任归义军节度使的曹元深即寺学学郎出身。因此,如悟真和尚衔命朝觐天子时,能够与京城高僧以诗酬赠,其又同灵俊撰写的大量邈真赞和恒安拟定的法事文范等等,都体现了敦煌僧人的文化水平。僧官们以在这些学问上的较高修养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作用。张议潮光复沙州之后遣使进京,僧慧苑是朝贡使之一,唐廷勅授为敦煌管内释门都监察僧正兼州学博士。这是个僧俗兼备的官衔,主管一方儒学教育的州学博士却由缁流担任,似为不类。杜牧《敦煌郡僧正慧苑除临坛大德制》^⑨谓其“利根事佛,馥力通儒”,嘱咐慧苑继续“勉宏两教,用化新邦”。又敦煌的杰出诗僧及其作品并不稀缺,伯2555《佚名诗五十九首》即为一组艺术成就较高的诗歌,是一位僧人于910年前后代表张承奉出使吐蕃时所作^⑩,从“童年方剃削,弱冠导群迷。儒释双披玩,声名独见跻”看,此僧佛儒兼通,享名不浅,正是代表官方出使的合适人选。上揭伯3556《应管内外释门都僧统帖》将释迦与素王之学并称,“良以人迷四倒,我佛利见于迦维;物惑三荒,孔父应生于鲁国。遂则阐五常百行之典,使在俗而指归;设三千八万之牒,遣出尘而依向……伏以当道虽临绝域,然在深蕃,是大国之一门,乃承天之双柱。英贤杰出,俊生挺生。畅儒教以照彰,演绎宗而清睦”。可见都僧统对儒佛各自作用的认识不失公正。

上述敦煌僧官选拔与升迁的因素,造就了一

①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第159-160页。

②伯4660《故沙州缁门三学法主李和尚写真赞》。

③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第170-171页。

④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第275-277页。

⑤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第269-270页。

⑥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第166-168页。

⑦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第128页。

⑧敦煌寺学基本情况可参阅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975-984页。

⑨[唐]杜牧撰《樊川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05-306页。

⑩陈国灿《敦煌五十九首佚名氏诗历史背景新探》,载氏《敦煌学史事新证》,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97-515页。

批知识技术型的缙流官僚,使唐宋之际以佛学为中心的敦煌学风与魏晋时代敦煌的炽盛儒风相得益彰。

二、作为重要因素的家世背景

《佛祖统纪》卷三九谓“学佛之士多自农出”^①。归义军时期的敦煌佛教则出现了新动向,即僧尼同僧官比较普遍出自高门大族。

唐长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一文指出士族地位的维护基本上不决定于“塚中枯骨”,而决定于眼前的权势^②。伯 3556《内外都僧统河西佛法主法严邈真赞》云和尚“俗姓陈氏,香号法严,即先大唐三藏州代之云孙矣”,即言法严和尚是玄奘后人,但仅依据一个姓氏的异同太薄弱了。而本赞最有价值的是“洎金山白帝国举贤良,念和尚雅望超群,宠赐恩荣之秩。爰至吏部尚书秉政莲府,大扇玄风,封赐内外都僧统之班,兼加河西佛法主之号……承恩任位,近经十有余年。”法严在张、曹交嬗之际都受到了政权当局的信任和关怀,以致执掌僧界十余年。可以说,只有保住这种眼前的权势,令族、鼎族、高门、轩门之美称才有现实意义。

因此,出家同任职于世俗政权、高门间通婚一道,都是敦煌权势家庭巩固地位和利益的必然选择,这造成了权贵家家有僧的现象。以敦煌阴氏为例,仅斯 2669 号文书即有 14 名阴姓僧尼,其他的如斯 2448、斯 2614V、伯 1261V 等亦屡见阴姓出家人。又伯 4640《阴处士碑稿》^③所示,阴嘉政之父乃“蕃朝改受得前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弟嘉义、嘉珍供职于府衙,又一弟乃“德范兢兢,三乘镜净”的僧人——都法律离缠,又有从弟僧灵宝,尼法律智惠,男僧常君等家庭成员。大量阴氏僧尼僧官的存在,说明了阴氏在敦煌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与阴氏在世俗社会的实际地位相呼应^④。

伯 3167《乾宁二年三月安国寺道场司常秘等状》^⑤显示有归义军押衙七人,营田使、兵马使各一人,其女申请受戒。斯 1563《甲戌年(914)西汉敦煌国圣文神武王准邓传嗣女出家勅》^⑥载,邓传嗣官为押衙知随军参谋,其女年仅十一岁即准备出家,文书钤有敦煌国天王印一方。据伯 4660《康通信邈真赞》^⑦,康通信实授河西节度押衙,落款“从弟释门法师恒安书”。恒安与康通信之关系不言自明,而继悟真出任都僧统的贤照更是康氏家族的光耀之星。据伯 3720《海晏墓志铭》,海晏成为都僧统是曹氏归义军开创者曹议金向后唐朝廷举荐的,其孙节度押衙阴子昇是曹议金第十二女之婿,其父阴季丰曾任凉州防御使,弟阴昇贤任归义军管内都知兵马使兼御史大夫,侄阴善雄任归义军节度内亲从都头。又伯 4640《索法律窟铭》除了记载索法律的祖父军功外,叙及其兄索清宁曾任沙州防城使,并有子三人,余二皆为押衙,而长子乃僧人常振。更有甚者,伯 3763V《年代不明(10 世纪中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曰“粟二斗,六月十七日沽酒看僧太子用……粟二斗僧太子来沽酒用”,这里时人称为僧太子的极可能是曹氏归义军时期某节度使之子出家为僧者^⑧。在莫高窟有关僧人的洞窟中,也将有权势的家族成员列入供养人行列。如 85 窟是都僧统翟法荣功德窟,列有“弟将仕郎守敦煌县尉承庆□□”、“侄男河西节度押衙兼监察御史怀恩”等。可见大族在僧俗两界威风煊赫,若言“敦煌学佛之士多自权势家出”则不诬。

僧人不是出自母胎便是僧人,不是一入佛门即自动成为僧官,其背后闪现着家族的深刻影响。伯 4660《阴法律邈真赞》谓其出自“敦煌令族,高门上户”,继言“释教栋梁,缙门石柱”。^⑨斯 4760《太平兴国六年(981)圣光寺尼修善等请戒慈等充寺职牒》^⑩曰“右件尼虽为晓辈,并是高门”,这几位被推任法律、寺职的比丘尼出身于大族,尼众

①[宋]释志磐撰《大正藏》第 49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年,第 362 页。

②参见《唐长孺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140 页。

③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第 69-77 页。

④张永安《敦煌阴氏地位研究》,《敦煌研究》2007 年第 2 期。

⑤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 66-67 页。

⑥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 64 页。

⑦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第 113 页。

⑧沙武田、赵晓星《归义军时期敦煌文献中的太子》,《敦煌研究》2003 年第 4 期。

⑨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 年,第 142 页。

⑩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 59 页。

“合徒慎选”的结果获得了都僧统钢惠的批准。有人认为到归义军晚期,门第在僧尼的升迁中发挥了显著作用^①。但并非到了归义军晚期才有此情况。斯6417《长兴二年(931)正月普光寺尼徒众圆证等状》^②指明几位候选尼“并是释中精雅,缙内豪宗”,这里显然包含了家庭因素,并早于上件半个世纪。因此,大族尼僧往往因其出身可在释门担任要职^③。如伯3556《灵修寺阁梨尼张氏戒珠邈真赞》^④谓其张太保之贵侄,“是以名因德播,贵以能升,迁秉义大德之高科,授教诫临坛之上位”;同号《普光寺法律尼清静戒邈真赞》言其乃张太保之贵孙;上揭伯3718《喜首写真赞》言喜首是“首厅宰相检校吏部尚书张公之中子也”,于曹议金秉政时擢为僧政。这是“贵以能升”的好注脚。

大族出身担任寺职僧官者也多见于莫高窟供养人题记。94窟是张淮深功德窟,题名有“妹师登坛大德尼德胜一心供养”、“妹师威仪尼花……一心供养”^⑤。55窟曹元忠功德窟有“故姨……法律尼临坛大德性真一心供养”、“外甥……法律临坛”题记^⑥。又144窟索氏家族修窟题记中亦有“妹灵修寺主比丘善……”、“姑灵修寺法律尼妙明一心供养”、“妹尼普光寺律师巧相一心供养”等^⑦。归义军里一般的官员家庭也有出任僧官的,Дx2586《索法律等名录》载“马孔目男二法律”。^⑧家世与权势对这些成长为寺院纲管或僧官的普通比丘、比丘尼存在着或深或浅的影响。

葛兆光认为唐代道教存在着世家传统。除了正一天师张氏、南阳叶氏,还有江西麻姑山邓氏、彭城刘氏等道教世家^⑨。敦煌佛教里也有类似情况,只是世代延续的僧尼家庭十分鲜见,但两代相继出家或祖孙出家的则很容易发现。Дx1380《惠

善等名录》中明显属于僧人家庭的有“愿进郭法师孙、再成龙(法)师男、富盈李老宿(?)男”等三人^⑩。伯2944《大乘圣光寺等尼名录》是各寺比丘尼名簿,今存大乘、圣光两寺。前者法号下标明与阁梨、法律有关系者七人;后者仅存一行名录五人,皆下注阁梨或法律。斯5718《天福十年(949)金光明寺比丘庆遂为故僧政百日设供疏》^⑪尾署“天福拾年五月廿二日哀侄比丘庆遂疏”,即过世的僧政是庆遂的伯叔。又斯2113《龙兴寺上座德胜功德记》,德胜为龙兴寺上座,其伯父法坚曾任三窟教授,弟法真又是金光明寺寺主、都僧政、都僧录等要职。这个马姓家庭不但出僧人还出僧官。

与这些普通僧尼有关的亲戚多为僧官,该背景是否能够有效促进他们在僧界获得良好发展呢?伯2856背《乾宁二年(895)三月十一日僧统和尚营葬榜》^⑫是都僧录贤照处理前任悟真葬事的,第五、六行云“香與仰亲情社慈惠律师、庆果律师。邈與仰子弟庆林律师、智刚律师。”“子弟”即出自悟真家族的子侄或孙辈。而敦煌地区的亲情社一般由同宗同族或有亲戚关系者组成,慈惠和庆果当是悟真的族人^⑬。上述四人的僧衔全是律师,律师的地位应是寺院一级的僧官^⑭。此文书显示了一组静态的从属关系:悟真是都僧统,其家族子弟出任律师。这一点,若同前揭斯6417、斯4760两文书所反映的情况结合起来看,庆林等人被擢为僧官明显有一个家庭因素在内。85窟法荣功德窟主室东壁门北侧五代供养人像列南向第一身题名曰“故……敦煌释门僧统沙门日俊”。如是,翟家自法荣之后又出了一位僧统,就目前对都僧统研究的共识,日俊应是副僧统较合情理。

① 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第96页。

②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53-54页。

③ 石小英《8至10世纪敦煌尼僧家庭地位》,《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3期。

④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第180-181页。

⑤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31页。本段引文中的省略号乃阙文之义。

⑥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18页。

⑦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65-66页。

⑧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167页。

⑨ 参见《最终的屈服——关于开元天宝时期的道教》,载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33-34页。

⑩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254页。

⑪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174页。

⑫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123-124页。

⑬ 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第376页。

⑭ 如开元寺律师神秀。

伯 3827《归义军节度授官牒样式》^①正可概括上述两个因素“牒奉处分,前件官,扶风名望,文武承家。祖宗累显于功勋,子侄常迁于官爵。况某自生人世,聪慧资心。幼年入于学堂,博达之百家奥典;壮岁出于军伍,勇猛之三略沉谋。才德振于一时,名利传于二郡”。在这里,家族名望、眼前权势以及自身知识修养,面面俱到,正是归义军当局授官不得不考虑的。

三、自然寿命与升迁时限的关系

伯 2942《永泰年代(765—766)河西巡抚使判集》云“人惟邦本,本固邦宁。时属艰难,所在防捍。稍有摇动,谁不流离。”^②敦煌处在帝国边陲,其政治与军事意义非同小可,再加上当地自然环境的艰苦,瓜沙边民的生存极富挑战。据杨际平等研究,自大统十三年(547)至大历四年(769),在统计到的63人中,均寿命约27.5岁。其中,天宝六载(749)以前25人,均寿命约31.9岁;乾元三年(760)至大历三年(768)38人,均寿命仅约24.6岁^③,归义军时期敦煌民众寿命可从该成果获得大致认识。僧人也是敦煌三万群众^④中的一部分,自然也逃不掉这个基本事实。

相对于一般民众的寿命,敦煌僧人在物质条件和生活方式上应该有长寿的优势。如斯2669《年代未详(869—870)沙州诸寺尼籍》^⑤显示尼姑年龄四十以上者比比皆是,甚至不乏古稀之年的比丘尼。但将僧人寿命的长短放到缁流仕途的升迁上,居然成了一大考验,这决定他们在正常状态下能否从一名纲管不断累迁,以致进阶到较高或最高层次。

因讨论的必要,整理一个有关各位僧官升迁实例表,见表1。

表1实例不能代表归义军时期僧官升迁的全部实际情况。但由此可知:以寺院三纲为代表的寺职与普通僧官的获任是僧人在僧界仕途的开始,只有初步获得了一般级别的官职,才有继续向

上攀升的可能。这是一个重要史实。而有关当时僧官被处罚、贬黜的直接资料目前尚未发现,北大图书馆藏D.185《灵图寺寄住僧道猷状》文书是间接涉及处罚一寺院僧政的^⑥。所以,我们读到的含有僧官信息的文书几乎都是升迁状态下的。

由上又可知,有数位僧人官止都僧政而终老于斯。此官职无疑是道门槛。伯3553《太平兴国三年(978)四月都僧统钢惠等上太保状》载“应管内外都僧统辩正大师赐紫钢惠都僧正赐紫法松都僧录赐紫道宾等”,则都僧政又在都僧录之前,似乎僧阶高于都僧录。嗣宗却是从都僧政擢为都僧录的。伯2054《疏请都僧统和尚等稿》显示的各位僧官顺序为:都僧统→都僧录→都僧政→僧政→法律/教授→判官。又伯2879《河西都僧统应管一十七寺僧尼籍》中“河西应管内外都僧录普济大师海藏”与“河西应管内外都僧统辩正大师钢慧”前后并列。因此这两个僧位的顺序不分轩轻。再者,从都僧录一职出任都僧统的不在少数,可见都僧录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坎,一旦被超越,即登上缁流顶峰。此为第二个应被重视的史实。

现以部分有较为具体升迁时间的僧官证成之:悟真于乾宁二年病逝,享年95岁,这是一个难以奢望的年龄。据斯1475《沙州寺户严君便麦契》、伯3770《敕河西节度使牒稿》^⑦及伯3720《大中五年至咸通十年(851—869)赐僧洪辩悟真等告身》中的告身文书^⑧,可知其于太和初年成为灵图寺寺主到担任都僧统时经历了40年之久,充足的寿命使其年届古稀能够出任都僧统一职。道真于后汉乾祐元年(948)任三界寺观音院院主,到北宋雍熙三年(986)升都僧录用了38年,据伯3320《乾德二年(964)九月十五日沙州三界寺授娘子张氏五戒牒》文末“受戒师主释门僧正赐紫道真”,是年其人不过僧正而已。愿清在后唐天成三年(928)到清泰三年(936)间任释门法律,至迟在北宋建隆三年(962)升为释门僧统,这一过

①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304页。

②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630页。

③杨际平等《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79页。

④关于敦煌人口可参见刘进宝《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⑤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215-228页。

⑥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第395-396页。

⑦齐陈骏、寒沁《河西都僧统悟真作品和见载文献系年》,《敦煌学辑刊》1993年2期,第6页。齐先生等将本契年代定在约829—835年,即太和三年至九年;将告身文书的年代定在大中二年至四年间,即张议潮初步控制敦煌时期。

⑧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29-32页。

程约用了 30 年的时间。贤照约在乾符年间 (874—879) 获法律僧衔到乾宁二年(895) 任都僧统也花去了 20 年。绍宗约在乾宁二年到天复二年(895—902) 间是敦煌净土寺的普通僧人 ,于后唐同光三年(925) 成为释门法律临坛供奉大德阐扬三教讲论大法师 ,至天成三年迄长兴元年

(928—930) 升任僧政 ,而获得这样中等级别的僧官用去了近 30 年的光阴。擢升的机会并未就此休止 ,约在后晋天福二年(937) 晋级都僧政 ,但于后周显德元年(954) 前病逝时止于此职^①。曾任都僧政的法镜大师“年期八十 ,示同殒灭”^② ,去世时年已耄耋而再未升迁。

表 1 有关僧官升迁实例

序号	法号或香号	升迁过程	信息主要来源
1	洪辩	(蕃占时期) 都法律兼副教授→都教授→(归唐) 都僧统兼摄沙州僧政法律	伯 4640《吴僧统碑》、伯 4660《吴和尚赞》
2	法荣	(蕃占时期) 法律→僧政→都教授→(归唐) 都僧录→都僧统	伯 4640《翟家碑》、伯 4660《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伯 4660《翟和尚邈真赞》
3	悟真	(蕃占时期) 灵图寺寺主→(归唐) 都法师→都僧录→副僧统→都僧统	伯 4660《悟真邈真赞》、伯 2748《唐和尚百岁书》、伯 3720 等《悟真文集》
4	崇恩	(归唐) 都教授→都僧录	伯 4010 + 4615《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
5	恒安	灵图寺知藏→节度门徒兼摄释门法师	伯 4660《康通信邈真赞》及恒安所撰释门文书
6	清和尚(贾清)	法律都判→僧政	伯 3556《贾僧正清和尚邈影赞》、斯 5718《金光明寺比丘庆遂为故僧政百日设供疏》
7	灵俊	都法律知福田司判官→僧政→都僧政	伯 3718《梁幸德邈真赞》及同号《阎子悦写真赞》撰者题衔
8	喜首	勾当五尼寺判官→都僧政	伯 3718《喜首写真赞》、斯 3905《金光明寺造窟上梁文》
9	法严	都僧录→都僧统	伯 3556《法严和尚邈真赞》
10	福高	都僧录→都僧统(曹议金时续任)	伯 3556《汜福高和尚邈真赞》
11	贤照	法律→僧政→都僧录→都僧统	伯 3556《河西管内佛法主赐紫邈真赞》
12	海印	福田判官→都僧政	伯 3718《汜海印和尚写真赞》、伯 3928《僧人牒状》
13	绍宗	法师→法律→僧政→都僧政	伯 2697《绍宗为亡母转念设斋施舍放良回向疏》、伯 2049《净土寺长兴二年辛卯岁直愿达牒》、98 窟南壁贤愚经变下端第十八身供养人题记
14	嗣宗	都僧政→都僧录→都僧统	斯 390《汜嗣宗和尚邈真赞》
15	志贞	灵图寺法律→敦煌唱导法将	伯 4660《宋律伯彩真赞》
16	神秀	开元寺律师→摄法师	斯 515 背《开元寺律师神秀牒补充摄法师牒》
17	龙藏	龙兴寺上座→应管释门都判官	144 窟五代时期供养题记
18	善才	法律兼勾当三窟→僧政	伯 3541《张善才邈真赞》
19	庆达	金光明寺主持毗尼教主→释门法律	44 窟北壁供养人像列第六身题记

可见 ,升迁时段的间隔过长实乃人为的障碍 ,我们也看到多数僧官是在都僧政(录) 这一高级僧衔上一直待到油尽灯枯。所以 ,归义军政权对高级僧官选拔和升擢的严格控制亦可从僧人获任不同阶别僧官时的年龄窥见一斑。

四、对群体因素的推测

还有一些升迁因素不甚明显 ,但其潜在影响不能忽视。一般而论 ,群体力量较之单一个体对事物发展的影响深重些。隋唐五代曾经大量存在

①屈直敏《敦煌高僧》,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年,第 52 页。
②伯 4660《入京进论大德兼管内都僧政赐紫沙门故曹僧政邈真赞》。

着各种各样的私社,这些民间结社大都建立在社人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以社人之间的患难与共,互相扶助为准则,一般按照地域组成,也有突破地域限制,由官吏、军人、妇女、工商业者等按性别、阶级、职业进行结合的^①。这些民间结社按照主要活动或社人成分的不同而有不同名称,如亲情社、官品社、女人社、坊巷社、香火社、燃灯社等等。敦煌文书有力证明了社的存在、构成与功用^②,同时敦煌本身就存在了许多社邑。

由僧人组成的社其数量不在少数,尤以僧官或者僧俗官员为成员的社。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下“结社法集”条云“社之法,以众轻成一重。济事成功,莫近于社。”^③且看伯 3218《某年八月三日年转帖》:

1 时年 转帖

2 右缘普光寺汜阉梨迁化,准例合有盖黄

3 助送。祭杏盘,此着当寺勾当。金光明寺 帖

4 至,限今日午时于西门外取齐。如有

5 后到,罚麦三斗;全不来看,罚麦六斗。

6 其帖各自示名递过者。

八月廿二日录事陈僧正 帖。

11 龙刘僧正 吴法律 乾张法律 程法律 开张

12 法律 索法律 永翟僧正 小翟僧正 金马僧

13 正 韩僧正 图张法律 曹法律 显索法律 梁

14 僧正 乾明曹禅 界刘僧正 张僧正 土李

15 僧正 高法律 莲安法律 李法律 恩索法

16 律 张法律 云李僧正 汜僧正 修李阉梨

17 米阉梨 圣申阉梨 张阉梨 国汜阉梨 李阉

18 梨 乘翟阉梨 马阉梨^④

这是僧官们自己组织的以营葬活动为主的社邑,以此提高葬仪的规格,扩大丧葬活动规模。当然这这也是一个成员以僧正法律为主体的民间团体。郝春文指出可能是由同年受具者组成的社邑。若是,此处 34 位当初的比丘比丘尼在僧界升迁步伐未免过于整齐划一了。在整个归义军僧官系统中,法律、僧正的数量比较庞大,他们都是处在底层位置的。因此,本件作为与僧尼有关的社邑文书,有几个特点需要注意:一是参加人数较多,二是社会地位和处境相似,三是牵涉的寺院广泛,包括了当时敦煌地区绝大多数的寺院。

伯 3037《庚寅年正月三日社司转帖》^⑤中的社众组成与上引文书小有差异“太子、翟僧正、曹僧正、安僧正、罗僧正、宋僧正、戒随阉梨、王僧正、汜法律、马法律、王法律、杨法律、徐法律、阎押牙、吴押牙、阴押牙、马押牙、高押牙、索草场、宋押牙、丑达阴押牙。”显然,此次聚会是以归义军政权里的上层人物“太子”为代表的,以及部分官员与僧官们所成立的社而举办的。这些团体除了通常的营葬活动、春秋座局席外,在一些缙流事务中如俸利分配、寺职僧官的推选与升迁上也是股影响上层决策的势力。

至于伯 3218 文书中的僧官是否为同年受具者,确难定论。伯 3423《丙戌年五月七日乾元寺新登戒僧次第历》^⑥是件同年受具者的文书,所载僧人法号以“愿”字开头的占绝大部分,其次以戒、智开头。伯 3779《乙酉年四月廿七日徒众转帖》^⑦僧号为戒某、保某者达数人。莫高窟 196 窟东壁门南侧供养人题记有六身法号标明为“戒某”者。故该现象应为同年受具者的一个特点,而伯 3218 不能提供其法号信息。

① 宁可《述社邑》,《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5 年第 1 期。

② 社邑文书基本情况与具体内容可参见宁可、郝春文编著的《敦煌社邑文书辑校》一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年。

③ 《大正藏》第 54 册,第 250 页。

④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年,第 356 页。所引文书包含了部分敦煌寺院的简称,龙指龙兴寺,乾指乾元寺,开指开元寺,永指永安寺或永康寺,金指金光明寺,图指灵图寺,显指显德寺,乾明指乾明寺,界指三界寺,土指净土寺,莲指莲台寺,恩指报恩寺,云指大云寺,修指灵修寺,圣指圣光寺,国指安国寺,乘指大乘寺。

⑤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第 327 页。

⑥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第 103-104 页。

⑦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第 357 页。

五、余论

前述之外,法缘关系是又一个可能有助升迁的因素。伯 4660《大唐沙州译经三藏大德吴和尚邈真赞》^①署名为“法学弟子比丘恒安书”。除了恒安,法成大师的弟子还有悟真、法镜、明照、洪真、福慧等人,而悟真也是洪辩的弟子。他们都有同学之谊。悟真是一路顺利升至都僧统的,法镜官止都僧政,恒安则做到法师一职。但恒安学佛似并非仅仅师从法成,据伯 4660《宋律伯彩真赞》^②、《入京进论大德兼管内都僧政赐紫沙门故曹僧政邈真赞》^③落款,则恒安亦是志贞、曹僧政之徒。伯 3718《僧政马和尚灵住邈真赞》^④系门人灵俊撰,灵住僧衔全称是:释门正僧政临坛供奉大德兼阐扬三教毗尼藏主赐紫沙门和尚。上举各赞主角本身在佛学修为和戒行上是可圈可点的,

这些弟子在其师点拨之下,于正统的佛学修养上应当不乏成就,这即是他们出任僧官的基础。因此,出自“名师高徒”这类法缘关系下的专业水平与素养对其升迁是有裨益的。

需指出的是,中古时期僧众推举寺主等纲管的方式与今日行用的可相照鉴。《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办法》^⑤(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第三条强调:住持的产生必须贯彻民主协商、选贤任能原则。该《办法》又列出担任住持要具备的五个基本条件,与本文相关的有:(二)信仰坚定,戒行清静,有较深的佛学造诣,品德服众,有较高威望;(五)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管理能力。作为仍在使用的历史遗产,民主推选寺院管理者的方式凸显出稳定而富有成效的一面^⑥。

(责任编辑:赵仁康)

Selection and Promotion of Dunhuang Monkish Officials during the Period of Rule by Return-to-Allegiance Army

SUN Ning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titles for monkish officials in the Dunhuang documents. But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the sufficient description of the factors that determined their selection and promotion in the extant documents as well as in the newly unearthed ones. Despite the difficul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onkish officials in the period of rule by the Return-to-Allegiance Army, and tries to examine the factors behind their qualification for the posts. We have found that the sel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monkish officials are determined by the following factors: their attainment in Buddhism, family background, life span, academic pedigree and possible social affiliations. Among these, the former two are the most significant, which is in agreement with the historical reality at that time. We hope our studies will help researchers better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at issue.

Key words: Dunhuang; period of rule by the Return-to-Allegiance Army; monkish officials; factors behind selection and promotion

①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第136页。

②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第135页。

③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第112页。

④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第266-268页。

⑤《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办法》,《法音》2010年第1期。

⑥孙宁《古今证一谈〈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办法〉》,《文史博览》(理论)2010年第11期。